

珠海人文风物丛书

关于近代珠海历史文化名人的 乡土口述史料

赵立彬 何文平 胡海峰 编
◎ 珠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珠海历史
文苑

8 5. 版社

珠海人文风物丛书

关于近代珠海历史文化名人的
乡土口述史料

赵立彬 何文平 胡海峰 编
◎ 珠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珠海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关于近代珠海历史文化名人的乡土口述史料 / 赵立彬
何文平 胡海峰编. -- 珠海 : 珠海出版社, 2010. 12
(珠海人文风物丛书 / 杨穆主编)
ISBN 978-7-5453-0498-5

I. ①关… II. ①赵…②何…③胡… III. ①名人—简介—珠海市
IV. ①K820.8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243792 号

关于近代珠海历史文化名人的乡土口述史料 (珠海人文风物丛书)

珠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编

责任编辑: 冯建华

装帧设计: 冯建华

出版发行: 珠海出版社

地 址: 珠海市香洲银桦路 566 号报业大厦 3 层

电 话: 0756-2639337 邮政编码: 519001

网 址: www.zhCBS.net

E - mail: zhCBS@zhCBS.net

印 刷: 珠海市壹朗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55.375 字数: 1100 千字

版 次: 2010 年 12 月第 1 版

2010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453-0498-5

定 价: 128.00 元 (全 4 册)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由承印厂负责调换

《珠海人文风物丛书》

编委会

主 任 黄晓东
成 员 徐惠萍 马 融 刘福祥
 黄河清 杨 穆 曹诗友
主 编 杨 穆
副主编 何沁兰
编 务 狐志昂 王玉琦 陈小英
 李 曼 王彩锋 危 燕
校 对 杨长征

【序】

刘志伟

历史，是过去的真实，这是讲述者的信念；历史，是现在与过去的对话，这是倾听者的心思。这两种立场，看似矛盾，实为一体，构成了历史的双重性格，由此引出的分歧、困惑与思考，令历史散漫出诱人的气息。人们虽以历史为“无用”之物，又总不忍离弃，甚至舍身投怀，执著坚守。在对历史真实永无止境的追寻及现实与过去之间无穷无尽的对话过程中，口述的历史总是比文字书写的历史更富有活力与魅力，因为历史一旦用文字记录下来，“真实”就凝固了，“对话”的空间也被限定了；而口述的历史，则为“真实”与“对话”打开了一个可以无限扩展的、变幻流动的空间。历史学者对口述历史的眷顾和迷恋，也许就是为这种魅力所吸引。

珠海的历史文化名人，许多都是在近代中国历史上叱咤风云的人物，学界对这些名人的研究，几乎可以说已经到了纤悉无遗的程度，坊间流行的著述也可谓汗牛充栋，而我们还要以这些人物为题材，花气力做一番“口述历史”，首先当然是为历史学者不断寻找过去发生的事实真相的使命所驱动。这里所说的寻找真相的追求，与是否要质疑既有的历史叙述的真伪无关，而是人们历史观念与历史关怀不断更新的需求。我们相信，所有的历史记忆，总是从记忆者的关怀出发，在记忆者视野范围内，经过有意识或无意识的挑选形成的。用文字记录的历史，是这些文字的书写者的历史记忆，不但受他们个人的知识、利益、价值、偏好和观念心态等等因素所左右，也是书写记录时的特定情景与时代的选

择。在非文字书写传播的途径下，由并不借助文字记录历史的人群传承的记忆，不言而喻地可能保存了不同的事实，寻找这些事实，以丰富人们对历史的认知和感悟，是口述历史最本份的目标。尤其是在当代历史学的关怀下，普通人的历史，他们的情感，他们的思维以及他们的日常生活越来越多进入历史研究者的视野，即使是名人的历史，人们越来越多关心的，也是他们作为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于是，口述历史自然成为一种寻找新历史事实的路径。

不过，口述历史最有魅力之处，还不只是从口述传统的历史记忆中获知新的历史事实，而是我们可以从这种历史记忆本身以及讲述者的叙述所倾听到的过去与现实之间的对话。人们对历史真实的追求，本质上都是现在与过去的对话。这种对话，既是人类的知识积累机制，也是文化认同的形成过程，由这种对话去寻找并理解过去发生过的历史事实，不同时代的文化精神与社会性格，是当代历史学的旨趣所在。在 19 世纪后期到 20 世纪中期，珠海这片土地曾经孕育了一大批杰出人士，他们在引领和推动近代中国的创造过程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今人虽然可以引以为傲，并以此激励后人，但这些荣耀毕竟已经成为过去。对于今日的珠海，这段曾经的辉煌究竟有什么意义？只是一种炫耀的谈资，还是一直深层次地影响着珠海人的生活及其文化内涵的资源？当地人的历史记忆，无疑是一种可以帮助我们寻找答案的最重要的信息。我们从本地人的记忆，可以了解到这些历史名人在本地的存在状态，从本地社会的脉络中把握他们的形象，倾听他们的声音。从这种存在于现世的形象，经今人发挥的声音，由今人对过去的想象，我们触摸到的既是过去，更是现在。口述历史展现的，不只是一种历史的记忆，更是传承这些历史记忆的人和社会。

所谓过去与现在的对话，不是在单一的“过去”和单一的“现在”之间展开的。所谓“过去”，是交织着种种矛盾与冲突、调和与平衡，并由不同历史时间的“现在”叠合构成的过去；所谓“现在”，亦是由形形色色的个人与群体的活动营造的现在。这些人群有不同的经历、不

同的知识背景、不同的喜好与情趣、不同的思维习惯、不同的价值观念、不同的处境和不同的动机，种种的差异，不但影响着他们对过去的记忆，亦规限着他们的表达。每个个体的记忆，都经历了不同的传承过程，由不同历史情景与认知主体的选择加以过滤并重塑。由此形成的口述历史，免不了变幻莫测，扑朔迷离。这对于治史之人来说，也许是一种困境，但也可以是一个生机。治史者凭着自己的学养、见识与研究技巧，自可从扑朔迷离的事实中理出历史的线索，获得新的知识，如此一来，治史者也就加入到了这种对话之中了。

治史者的加入，结果一定是令到口述传统的历史向文字传统的历史靠拢，口述历史由此向文字书写历史转变。我们必须承认，治史者建立“口述历史”的努力，其实是把口述历史引离口述传统的一种强暴行为。在这个过程的每一个环节，都会成为以旁观者自居的学者加入到现在与过去对话的入口。口述历史的收集者，无论多么小心翼翼自觉努力避免引导讲述者，都不可能真的是一个完全被动的倾听者，他们的兴趣，他们既有的历史认识和取舍，都可以通过他们提出的问题、提问的方式、现场的反应以至不经意表露出来的态度，影响讲述者对记忆的搜索和表达的选择。接下来，由访谈时的口头表达到访谈者笔下的文字记录，也免不了经历一次直接的过滤，即使用录音设备把谈话完整无遗地录下，整理过程也往往免不了滤去不少信息，何况讲述过程的信息表达，并不只是由言语来传递。操控文字的人加入到现实与过去对话中最关键一着，也许是把口述历史的记录经过编辑付诸出版的过程，在这个时候，不仅整理者、编辑者和出版者都会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加入自己的声音，文字书写的规范、行文的逻辑、出版的标准，都一起涌上来，口述历史最终逃脱不了屈从于文字表达规则的宿命。

所以，当我们把收集到的口述资料整理成文字、编辑成帙之后，所谓口述史实质上就变身成为文字记录的历史了。但是，钟情于口述史的学者也不需要为此感到沮丧。我们应该明白，历史这个范畴的本来意义，就是用文字记录下来的过去，而文字书写的历史，追根究底，也从

来都出自口述记忆。所谓口述史既然是文字记录历史的一个源泉，也就因此可以给予文字历史无尽的活力。只要口头的表达不可能取代文字的表达，我们就不应该以为或期待口述史真的会取代文字书写的历史。研究者不断地从口述史寻找历史的源泉的时候，更多收获到的，其实是在这个过程中训练自己对文字记录的敏感和理解能力，培养一种更能够亲近历史的历史观。因此，尽管口述史一旦用文字记录下来，成为书写的历史，其魅力便渐见消退，但史家对口述史的热情，是不应该也不会消退的。既然人们思想、感情和记忆总是在流动中，每日常新，口述历史的工作，就应该反复持续地进行下去，成为历史认知与历史智慧的永不枯竭的源泉。

基于这样的认识，我相信我们这些在大学从事历史教育的人是幸运的，我们有机会年复一年地同学生一起去做口述史调查，一起去倾听书本之外的声音，寻找文字之外的记忆。通过一代一代学生们的口述史训练，我们得以一直追踪着口述传统的脉络，延伸着口述历史的魅力。虽然我们总是希望能够把每次口述历史调查收集的资料连同我们的心得用文字记录下来，履行历史学者用文字记录历史的职责，但我们不会放弃对口述历史的执著，因为口述历史不仅令到我们所认识的过去更为生动和丰富，更可以培养我们阅读和理解文字书写历史的智慧。

在这本口述历史的文字记录付梓之际，写下这点感想，既是凭吊那些被文字扼杀的声音，更期望唤出匿藏于文字中的灵魂，让历史引领我们前行！

2010年9月20日草于沙田城门河畔

前 言

一、独特的人文资源与地域文化

近代珠海，人文荟萃。

第一个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并获得学士学位、被誉为“中国留学生之父”的容闳（1828-1912），是南屏镇人，其故居遗址（容闳诞生地）位于南屏镇西大街三巷1号。

官费留美学生、曾任中华民国首任内阁总理、后出任中山模范县县长的唐绍仪（1862-1938），是唐家湾镇人，其办公地望慈山房现为唐家老人活动中心，私家花园唐家共乐园及其故居均位于唐家湾镇山房路。

第一批官费留美学生、曾任上海海关译员、袁世凯幕僚、津海关监督、天津北洋大学校长的蔡绍基（1859-?），是拱北北岭村人。

第二批官费赴美留学学生、清华学校（清华大学前身）的首任校长唐国安，是唐家湾镇鸡山村人，其故居位于唐家湾镇鸡山村。

第三批官费赴美留学学生、归国后历任清政府海军部筹建处司长、军制司司长、海军部次长的徐振鹏（1860-?），是拱北北岭村人。

第三批官费赴美留学学生、辛亥革命后任袁世凯高等军事顾问、英文秘书、税务会办、民国初年在政坛极其活跃的蔡廷干（1861-1935），是唐家湾镇怎么金鼎外沙村人。

第三批官费赴美留学学生、民国成立后曾任交通总长、外交总长的

梁如浩（1863-?），是唐家湾镇人。

第三批官费赴美留学学生、资产阶级革命派第一张报纸《中国日报》的创办者之一、容闳的族弟容星桥（1865-1933），是南屏镇人，其故居位于南屏镇长房街15号。

留美博士、民国时任北京农业大学校长、清华大学教授的唐有恒（1884-1958），是唐家湾镇人。

孙中山元配夫人卢慕贞（1867-1952），是唐家湾镇金鼎外沙村人，其故居位于唐家湾镇金鼎外沙村。

黄兴夫人、辛亥革命时期重要的女革命者徐宗汉（1877-1944），是拱北北岭村人。

国民党元老邹鲁的夫人、辛亥革命时期的女革命者梁定慧（1893-1982），是唐家湾镇人。

中国近代著名实业家徐润（1838-1911），其故居旧址位于拱北北岭村。

主持修建第一条国产铁路的开滦煤矿创始人、曾任中国近代最大的民用企业轮船招商局总办的唐廷枢（1832-1892），是唐家湾镇人。

曾任香港太古洋行总买办的莫仕扬（?-1879），是唐家湾镇金鼎镇会同村人。

曾任清政府驻夏威夷王国首任领事、华侨首位百万富翁陈芳（1825-1906），是前山梅溪村人，其故居及墓地均在今梅溪牌坊景区内。

陈芳次子、巨商、民国时曾出任广东省省长的陈席儒（1859-1937），是前山梅溪村人。

华南地区最早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在党史界与李大同并称“北李南杨”的杨匏安（1896-1931），是南屏镇北山村人，其故居原址位于北山村。

曾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委员长、广州苏维埃政府主席的苏兆征（1885-1929），是淇澳岛人，其故居位于淇澳村白石街东溪坊。

中共早期工人运动的先驱、曾任中华全国总工会第一届执行委员会

委员长、领导香港海员工人大罢工、省港大罢工的林伟民（1887-1927），是三灶镇西洋田村人，今三灶建有伟民广场。

在中国近代文学史上享有盛誉的“诗僧”苏曼殊（1884-1918），是前山沥溪村人，其故居位于沥溪村苏家巷。

中国体育史上第一位世界冠军获得者容国团（1937-1968），是南屏镇人。

……

弹丸之地，人才辈出，灿若星辰。

近代历史文化名人出现在珠海，有以下几个显著的特征：

第一，人才集中出现，形成人才群，各个群体人才具有一定的连带关系。现今珠海一地，管辖陆地面积仅约 1600 平方千米，而出现如此数量的近代风云人物。这些历史名人大体上可以划分为：以容闳为代表并因其推动而形成的留学群体；以唐廷枢、徐润为代表的实业家群体；以苏兆征、杨匏安为代表的革命家群体；以陈芳、蔡昌为代表的侨商群体。其中留学群体在人才群中起着枢纽的作用。

第二，珠海名人思维趋新，敢于领先，体现了近代中西文化交汇融合的优势，顺应了近代中国的进步潮流。无论是倡导留学、培养各方面顶尖人才，开创现代教育事业，还是发展民族工商业，或者参与新旧民主革命，建设模范县，直至当代的改革开放，珠海人都走在历史的前面，积极进取，为天下先，为其他地区垂范。

第三，珠海历史文化名人的实际影响不限于地方，而是影响全局，在整个中国近代历史舞台上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从这个意义上，近代珠海历史文化名人并不仅仅是珠海本地的名人，他们同时是整个近代中国杰出人物的代表，他们的事业从珠海起步，而在全局范围内发挥着重要的影响。

近代珠海能够产生如此多且重要的文化名人，是与珠海地处中西文化交汇点的地位分不开的。在这个特殊的地理位置上，在中西优秀文化的共同作用下，逐步形成珠海地方的独特的文化氛围，综采中西文化之

长，诞生了外向型、进取型、开放型的地方文化特征。长期以来，珠海地处中国传统文化边缘，但自明清以来，由于澳门的因素，珠海成为中西文化交融的前沿地区，文化地位骤然上升，并形成了有自身特色的地域文化。到了近代，在一代代历史文化人物的推动下，这一地域文化蓬勃发展，活力四射，对近代中国文化的发展起到了莫大的作用。其中包含的新的文化特质，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中国文化在受到西方文化影响后未来发展的方向，并且通过自身的文化传播，驱动着中国其他区域的文化进程。新的现代因素的继续注入，对于中国当代的社会变革全局产生强烈的示范作用。这便形成文化学上所说的一个小的“文化圈围”。“文化圈围”是由地理、生物、心理及文化各种要素的影响而形成的某一社会的文化，“是某一种文化的整个方面的表示，而别于他种文化圈围。它也可以叫做研究文化的单位，好像政治学上的政府，经济学上的财产，生物学上的生命，天文学上的天体”^①。地域文化的自觉，当然不应勉强地预先划定边界，提炼特点，而应从文化的角度，从不同文化的交融冲突和发展趋势上加以理解。但是由于地域有地域的特点，各个地域文化演进的速率不同，因而在不否定地域文化与大文化具有同质性的前提下，地域文化的特征仍然可以把握。近代学者简又文说广东文化“其实应该说‘中国文化在广东’”^②，近代以前珠海的文化大致可以说是这样；近代学者陈序经说南方文化实质上“是一种舶来的西洋文化”^③，对于本来存在文化空白的地区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形。但近代珠海文化是在中西文化的冲突与交融的大背景下，由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中多种文化因子共同作用而形成，两种文化的部分特质都有体现，确实是有自身特征的新质文化。

珠海近代历史文化名人研究是研究珠海本地文化的重要内容，同时

① 陈序经：《中国文化的出路》，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年，第11页。

② 简又文：《广东文化之研究》，广东文物展览会编印、中国文化协进会刊行：《广东文物》下册，1940年，第658页。

③ 陈序经：《南北文化观》，《岭南学报》，第3卷第3期。

也是研究中国近代文化变迁的有益课题。对于近代珠海历史文化名人的研究，已经取得相当的成果，主要体现在：珠海历史文化名人受到广泛重视，有各种人物传记、文史资料、文献的出版；珠海历史文化名人的研究已经具有了国际性，举办了多次国际学术研讨会，国外重要研究机构和学者均有专门研究；对重点人物的研究，如容闳、唐绍仪、陈芳等，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仅以容闳研究为例。美国华盛顿州州立学院历史学教授勒法吉博士著《中国留美幼童史》出版于1942年，是较早的关于中国留美幼童的专门研究著作。后来高宗鲁先生补充了一批未刊照片、手迹和书信，将该书译为中文，在海峡两岸先后出版，极大地推动了对于容闳和留美幼童的研究^①。台湾学者编有《容闳传记资料》^②。1980年代以来，顾长声、李喜所等分别有容闳研究的专著，容闳故乡的刘中国和黄晓东也著有新的容闳传记^③。关于容闳研究，自1980年代以来，已经举办过多次国际研讨会，分别出版了各种会议论文集，近期出版的《容闳与中国近代化》、《容闳与科教兴国》等论文集，汇合了参加国际学术研讨会的各地学者的研究成果，对于容闳与近代中国的方方面面的具体问题展开深入的讨论。其中不少作者是海内外学术界的卓然大家，他们的论文在学术上也具有典范的意义。^④珠海地方出版的《珠海历史名人》、《珠海人物传》，刊载了近代留学先驱各人的传略；《珠海文史》刊载了大量的近代珠海留学精英的相关史料^⑤。2004年，

① Thomas E. La Fargue: *China's First Hundred: Educational Mission Stud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1872-1881*, Pullman, Washington State College, 1942; 高宗鲁译:《中国幼童留美史》，台北：华欣文化事业公司，1982年；珠海出版社，2006年。

② 朱传誉：《容闳传记资料》，台北：天一出版社，1979年。

③ 顾长声：《容闳：向西方学习的先驱》，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李喜所：《容闳：中国留学生之父》，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0年；刘中国、黄晓东：《容闳传》，珠海：珠海出版社，2003年；刘中国、黄晓东：《中国留学之父——容闳》，珠海：珠海出版社，2006年。

④ 吴文莱主编：《容闳与中国近代化》，珠海：珠海出版社，1999年；高群书、吴文莱主编：《容闳与科教兴国——纪念容闳毕业于耶鲁大学150周年论文集》，珠海出版社，2006年。

⑤ 珠海市政协编：《珠海人物传》（上、下册），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2、1993年；张耀中主编：《珠海历史名人》（首卷、二卷），珠海：珠海出版社，2001、2004年。

珠海容闳与留美幼童研究会成立，推动了珠海对于容闳和留学文化的研究。2006年，《珠海历史文化书系》出版，其中《容闳与留美幼童研究丛书》，对于珠海留学文化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该丛书收录了关于留美幼童研究的重要史料，如高宗鲁教授整理的《中国留美幼童书信集》、留美幼童李恩富的《我的中国童年》、留美幼童容尚谦的《创办出洋局及官学生历史》等^①。出于地缘的优势，珠海的研究者对于其他本土先贤给予了充分的关注。张晓辉、苏苑的学术专著《唐绍仪传》及经过改写面向非专业读者的《中华民国第一任内阁总理——唐绍仪》，分别满足了不同需求层次的读者；^②《唐绍仪研究论文集》和历次唐绍仪研究的学术研讨会的举办也显示了这一人物在学术界所受的重视^③。对于杨匏安、苏兆征、容国团等人物，也有专题著作，这些著作对中国近现代史研究，是一个有益的补充。

以上成果，为进一步展开研究奠定了基础。既往研究的主要特点，一是主要依据文献资料，二是重在人物事迹。而史料的进一步开拓、对历史文化名人相关的更深入的课题研究、特别是将近代历史文化名人与珠海整体的社会变迁联系起来考察，仍然具有广大的空间。近代珠海历史文化名人的群体性涌现，与近代珠海地区的中西文化交流及社会变迁具有强烈和显著的互动关系。一方面，近代珠海地区的社会变迁，对于短时期内具有进步意义的人才群的出现，影响巨大。另一方面，近代珠海历史文化名人对于珠海地区的近代化，也产生良性推动和持续影响。直至今日，作为乡土文化的重要历史资源，近代历史文化名人的文化功能仍然得以充分的发挥，对于今日珠海的经济建设和精神文明，都具有积极的作用。这些关系，在近代珠海历史文化名人的乡土口述史料调研

① 以上各著作均由珠海出版社出版，2006年。

② 张晓辉、苏苑：《唐绍仪传》，珠海出版社，2004年；张晓辉、苏苑：《中华民国第一任内阁总理——唐绍仪》，珠海出版社，2006年。

③ 珠海市政协、暨南大学历史系编：《唐绍仪研究论文集》，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9年；政协珠海市委委员会编。张晓辉，苏苑著：《唐绍仪传：中华民国第一任内阁总理》，珠海：珠海出版社，2004年。

中，可以得到明确的体现。

二、民间叙述，乡土关怀

现代史学在立足于文献资料的同时，越来越注重求索人们的记忆。口述史于 20 世纪上半叶在西方勃然兴起，成为历史研究的一个前沿领域。它沟通传统的历史学与社会学、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在研究视野和研究方法上都具有比较明显的优势，成为当代历史研究的重要方法之一。

口述史料在史料类别上相对于文献史料。关于口述史的定义，学术界莫衷一是，见仁见智。通俗地说，口述史就是借助现代的技术方法，通过调查采访将人们口头流传的或亲口讲述的内容记录下来，作为史料储存和研究。在远古时期历史文献大量出现之前，人们就是通过口头转述的方式将历史流传下来，如古希腊的《荷马史诗》、中国藏族的《格萨尔王传》等即是。中国汉代的司马迁撰写《史记》，就遍游各地，采集了许多口述史料，如在《淮阴侯列传》里记载了韩信少年时代的事迹，其来源，司马迁写道：

吾如淮阴，淮阴人为余言，韩信虽为布衣时，其志与众异。其母死，贫无以葬，然乃行营高敞地，令其旁可置万家。余视其母冢，良然。^①

这正是我们所理解的乡土口述史料。这种在韩信故乡访问所得的信息不仅为司马迁理解传主思想和性格具有重要的启发，而且提示了史家在对传主盖棺论定时有更深一步的思考和感慨。随后司马迁针对韩信个人的历史命运评论道：“假令韩信学道谦让，不伐己功，不矜其能，

^① 司马迁：《史记·淮阴侯列传》。

则庶几哉，于汉家勋可以比周、召、太公之徒，后世血食矣。不务出此，而天下已集，乃谋畔逆，夷灭宗族，不亦宜乎！”

因此，近代中国新史学的开创者梁启超将口述史料（口碑）列为“文字记录以外者”的史料的重要门类，他指出：

采访而得其口说，此即口碑性质之史料也。司马迁作史，多用此法。^①

广义地说，新中国成立后，学术界也做过大量的口述史工作，在五六十年代，曾经大规模地组织人员深入基层群众，采集相关史料，诸如太平天国、义和团、辛亥革命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以及“家史、村史、厂史、社史”的资料收集。因为这些事件，在既有的文献史料中，往往比较缺乏，或者比较片面，甚至是被歪曲的。但这一时期的口述史工作还是具有过于强烈的观点倾向性，口述史料获取手段上的功利色彩也较浓重，对于口述史料的理论分析方面比较淡薄。

现代口述史学 20 世纪 40 年代兴起于西方，80 年代开始被介绍到中国，近年来出现了较大的发展，取得了一定的成果。现代口述史学发展起来后，对于口述工作的要求，不再仅仅局限在有目的地访得某种史料为主的朴素阶段，而是在理论和方法上都有非常深入的新的思考，对于历史学问题意识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可以说，现代口述史学理论在一定程度上改变着人们对于历史的看法。近年来，在国内，口述史工作比较突出的成就有几个方面：一是对现当代重大历史事件中的关键人物进行口述史料的采集，包括一些担任过党和国家重要领导职务的人士的口述史料。二是对一批重要的学者、思想家、科技工作者本人进行的口述史料收集。三是对一些特定群体，如知识青年、女知青、宗教界人士等。四是抗战史的口述资料收集，特别是日军侵华暴行口述调

^①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 年，第 46 页。

查、部分地区抗战口述调查等。五是对一些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史的调查。此外，口述史的相关理论研究也取得十分丰富的成果，以口述史为专题的学术研讨会已举办多次，并与国际学术界建立起密切的联系。口述史在当代中国方兴未艾，日益成为一门新兴学科。就目前开展的情况来看，因各自开展口述史工作的具体课题的目标不同，所依据的学理不同，因而呈现出形式各异、各有侧重的特征，但其日益繁荣和受到重视则是不争的事实，预示着口述史工作在历史和文化研究中将日益发挥重要的作用。

“关于近代珠海历史文化名人的乡土口述史料”课题就是口述史实践与历史研究相结合的一个尝试。我们组织开展特约采访和田野调查相结合的方式，特别注重田野采访，进行口述史料的收集。因为我们认识到，除了史家书写的历史之外，有关这些历史人物的乡土口述历史也大量存在。在口述史资料收集过程中，不仅注意与历史人物相关的资料，也包括近代珠海地区的社会经济情况、人口外迁（出洋谋生）状况、家族影响、历史人物与乡土社会联系及其影响等领域的历史记忆。而且，从民间记忆的历史中，可以探索历史文化名人在本土的生存状态和他们的声名、精神遗产在故乡的建构过程，进一步发掘珠海历史文化名人的可贵资源。预定的主要内容有：

1. 乡土民众所见、所闻、所传闻之近代珠海历史文化名人；
2. 以历史文化名人为中心的乡土社区社会关系变迁；
3. 珠海历史文化名人资源的发掘对珠海现代化建设的现实意义。

为此，我们以近代文化名人作为中心，以名人与珠海近代社会变迁及长期影响为重点，扩展关注面。设计的访谈提纲主要包含了以下各方面：

（一）乡土社会

1. 本村最早的情形、有哪些姓氏？谁最早来？关系如何？
2. 本家族何以到此地？最早从事什么职业？在清代及民